

大理总管段氏 世系及其与 蒙元政权关系 研究

方慧 / 著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云南教育出版社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 总 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从 1981 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整整 20 年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专业点之一，也是当时云南省惟一的博士学位授权点。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应该归功于“南中泰斗，滇史巨擘”方国瑜教授。创建一个博士学位培养点和授权点，关键在于有一位杰出的学术领导人。学术领导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师，而是导师们的导师。方国瑜教授在中国民族史、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云南地方史等领域，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学术权威。作为学术领导人，具有学术权威诚然是先决条件，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有正直的道德品行、独立的人格操守、高尚的学术品德，不追名逐利、不畏权惧势、不趋炎附势、不媚俗随时。做学问就是做人，做人过不了关，所做学问通常也难以经得起检验。方国瑜教授时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他信守的格言是：“不淹没前人，更胜过前人。”对于方国瑜教授，尊

重前人成果，严守学术规范，已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自觉的行动。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耕耘，不论乌云压城还是浊浪翻滚，不论党同伐异还是流言蜚语，他始终坚定不移、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奋力前行，终于成为一代宗师、一代昆仑。方国瑜教授在学术上的献身精神以及对本专业发自内心的挚爱，成为学子的楷模和表率；神圣的敬业精神和严正的学者风范铸造了他自身人格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不少学子慕名投身他的门下。自他执教于云南大学以来，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几代学者，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术领导人。

方国瑜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创办中国民族史教研室时，江应樑教授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应樑教授原来是从事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教学的，他擅长田野研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德宏、凉山、西双版纳等民族地区做田野研究，写成《摆夷的经济生活》、《摆夷的文化生活》、《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等人类学（民族学）的传世之作。江应樑教授加盟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将人类学、社会学田野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和他自己从事田野研究的丰富经验带到民族史研究中，提出“人类学与民族研究的结合”的命题，为云南大学的民族史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新的贡献。五六十年代，他和方国瑜教授一起，培养了三届七位副博士（硕士）研究生。60 年代，他与方国瑜教授一起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三大册。80 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中国民族史》的编写工作。这套书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方国瑜逝世后，江

应樑教授成为中国民族史重点学科的领导人。他培养了十数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生现已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出色的成绩，成为新一代的专家、学者。

尤中教授 195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他从方国瑜的学生成为方国瑜的助手，进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教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尤中教授在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中国民族史的田野里勤恳地耕耘，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数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以骄人的成就，成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开创中国民族史专业，筚路蓝缕，备尝艰辛。在众人追赶热浪的时候他去自守“冷门”。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政治觉悟不高”、“白专典型”，他也置之不理，依然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学问，真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晚年，他在《滇史论丛·自序——略述治学经历》中回首往事时，不无自豪地说：“1954 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方国瑜先生的《略述治学经历》是在 1980 年写成的。20 年过去了，薪尽火传，一代新人继承方国瑜先生的遗志，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中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新的成果。从方国瑜培养中国第一个民族史博士研究生开始到现在，云南大学已培养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三十余位。

这些研究生以方国瑜先生为榜样，潜心学术、淡泊名利，对所学专业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并将这种感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强大动力。

方国瑜、江应樑、尤中等老一辈学者为云南省以至整个中国的民族史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在云南学术史上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新一代的博士们，有比前人更好的社会条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理应做出更大的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民族史学不是一门可以很快普及的学问，要入门不容易，登堂入室就更难，需要长时间的坚忍不拔的努力，需要百折不挠的精神，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需要清醒冷静的钻研。我毫不怀疑，新一代的博士们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优秀的学术传统，在新世纪创造出无愧前人、无愧时代的新成果。

现在，我们从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论文中，选编一部分博士论文出版。这些论文，经过同行专家严格、认真的评审，并通过资深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现在，作者又作了修订。不是说，这些论文都已尽善尽美，但毫无疑问，这些论文都是同行专家们一致肯定的创新性成果，都遵循了方国瑜先生“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教诲。

这些博士论文出版时，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已不及见了。这些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方国瑜先生期盼的民族史研究的繁荣景象的确已经到来。方国瑜先生和江应樑先生九泉有知，当感无限欣慰。他们也会鼓励我们：学无止境，应当戒骄戒躁，兢兢业业，不断进取。

林超民 谨识

2001年6月于云南大学补拙斋

论文提要

元朝灭大理后，云南改设行省，原大理国主段氏及其族属于国破之余，仍世代袭职为大理总管，与有元一代相始终。关于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如何演变，有什么特点和意义，这在西南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待发之覆。根据散见的史料及近年来新发现的碑刻和经卷等有关文献，并加以排比分析，写成论文《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年历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系研究》，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下篇为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

关于大理段氏总管的世次年历，各书的记载很不一致，有十一总管说，十二总管说等。各位总管的系属和在位年限，更属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上篇首先列举有代表性的淡生堂本、王本、大理钞本《南诏野史》及胡蔚《增订南诏野史》关于大理段氏总管世次年历的记载，然后依次分别加以考订，发现所谓十一总管或十二总管中的段庆、段光当时虽权位甚高，而实际上并没有做过总管。又十二总管中的段世并无其人，“段世”源于“段氏”，而“段氏”具体指的是“段明”，因此历来认为的十一总管或十二总管是不准确的，应为九总管。此外，还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对九总管的系出及其在位的年限，逐一进行考证，提出新说。最后据考证所得，列出《新拟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及年历》表。

下篇论述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演变。这牵涉到如何划分关系演变的阶段问题。过去学术界一般有两种看法：有的分为两个阶段，即从合作到争夺；有的分为三个阶段，即合作——限制——交兵。本文经过进一步的探讨，提出将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元宪宗三年至元十年（公元1253～1273年），为宗王统制时期，蒙元政权对段氏主要是依靠、利用；第二阶段由至元十一年至天历二年（公元1274～1329年），为行省、宗王、大理总管段氏并立时期，此期间元、段关系的特点是行省对段氏的权力进行限制，同时继续实行利用；第三阶段由至顺元年至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30～1366年），为元、段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关于元、段分域构隙的始年，本文经过悉心考察，特别由天历兵变中段氏坐视不救等事来参证，说明此时段氏对蒙元政权已出现游离、拥兵自重的苗头，所以把天历兵变之年即至顺元年定为此一时期开始之年。又元、段交兵，《滇载记》系于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以下各书多从之，本文经过具体分析，认为至大二年为时未免过早，无可取证，并提出至大当为至正之误，如此始能与段光在世的年代相合。第四阶段为至正二十七年至洪武十五年（公元1367～1382年），梁段交恶，同亡于明。说明段氏与梁王从相争到相持，而明朝乘机从中进行离间分化，并派大军入滇，段梁同归于尽，段氏作为地方势力，退出大理地区。

第二部分为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剖析，主要论证三

点：第一，蒙元政权团结作为民族上层代表人物的段氏，使云南的政局在稳定中求发展，总的说来是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第二，元段关系的演变给人们的启示是：蒙元与段氏的关系受到全国局势的制约，元政权的强固是维系与段氏关系的前提，而行省与王府的事权不一，又给段氏以可乘之隙。至于梁王毒杀段功，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第三，安定、统一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云南自古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元朝在云南实行的各项政策，使云南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统一，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蒙元统治者和以大理段氏为首的土官都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进程，但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却日益频繁，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和光辉的文化，共同保卫和建设祖国的边疆，这才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这篇论文的主旨所在。

本文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前人未见有系统的论述，因此钩沉爬梳，虽费心力，而一得之愚，不敢以其为必是，敬请诸贤达进而教正之。

前言

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出现的长期分裂、混战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从而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统治中国虽然不及百年（公元 1276 ~ 1368 年），但却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朝代。在云南地方史上说来，也有其划时代的意义：继唐代始建的南诏之后而建立的大理国宣告灭亡，从此，统治云南历时五百余年的地方政权结束了。云南作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省，纳入了全国统一的行政轨道，这就大大加强了云南跟内地的政治联系，为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条件。

应该看到，元朝政府针对云南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做到了唐、宋两代中原统治者没有做到的事情。总的说来，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基本上是巩固的、有成效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有元一代，蒙元统治者较好地处理了云南的民族问题，特别重视团结民族上层，任用他们担任土职，这在减少民族隔阂，稳定民族地区的局势，巩固其对云南的统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中，蒙元政权与大理国主段氏及其后裔即历任大理总管的关系，最有代表性，值得作深入的探讨。这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

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过去史学界也有前辈注意到这一点，有所评述，但因文献不足，未及深考（见夏光南：《云南史地丛考》所收《滇政之统系》条）。地不爱宝，近年来，云南陆续发现了若干元代碑刻，其中不少有关大理总管世系年历的资料，或亦涉及其与蒙元政权的关系。凡此种种，均为前人所未及见。吾人幸而生当其时，敢不自勉！故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元碑、地方史乘及其他载籍中有关文献，稍事钩稽排比，疏通证明，成《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年历及其与蒙元政权关系研究》一文，计分上、下两篇：上篇考订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及年历，下篇对历任大理段氏总管与蒙元政权关系的演变及相互势力的消长试作考说，并旁及有元一代云南蒙、白族、汉族、彝族、回族等各民族之间多方面关系的发展，期能拾遗补阙，或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之一助云。

目 录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总序	林超民	1
论文提要		1
前言		1

上篇 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

第一章 各书所载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	2
第一节 淡生堂钞本《南诏野史》	3
一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世次	3
二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在职年份	3
第二节 王本《南诏野史》	4
一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世次	4
二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在职年份	4
第三节 大理钞本《南诏野史》	6
一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世次	6
二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在职年份	6
第四节 胡蔚《增订南诏野史》	7
一 大理段氏十二总管世次	7

二 大理段氏十二总管在职年份	8
第二章 大理段氏十二总管世次年历考	9
第一节 段实	9
第二节 段忠	14
第三节 段庆	15
第四节 段正	15
第五节 段隆	17
第六节 段俊	18
第七节 段义	20
第八节 段光	21
第九节 段功	22
第十节 段宝	23
第十一节 段明（附段世）	24
第十二节 论段庆、段光未任大理总管	27
第三章 新拟大理总管段氏世次及年历	36
第一节 大理段氏九总管世次	36
第二节 大理段氏九总管在职年份	37

下篇 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的关系

第一章 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的演变	42
第一节 宗王统制时期（公元 1253 ~ 1273 年）	43
一 蒙元统治者对云南的特别重视	43
二 蒙元统治者对段氏的倚重	46
三 段氏对蒙元政权所作贡献	48
四 宗王的统制	54
第二节 行省、宗王、大理总管段氏并立时期 （公元 1274 ~ 1329 年）	58
一 行省的建立	59
二 行省建立后所采取的措施	60
三 段氏、行省和宗王之间的关系	64
四 段氏对蒙元政权的态度	76
第三节 元段分域构隙，段氏势力坐大时期 （公元 1330 ~ 1366 年）	78
一 天历兵变中的段氏	81

二	梁王总揽大权，行省有名无实，段氏坐大一方	91
三	段功被杀，梁段关系急转直下	95
第四节	梁段交恶，同亡于明（公元1367~1382年）	98
一	梁段由相争到相持	98
二	明朝对梁段的离间分化	102
三	明兵入滇，梁段同归于尽	104
四	段氏作为地方势力退出大理地区	105
第二章	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剖析	121
第一节	成功的民族政策	122
第二节	元政权的强固是维系与段氏关系的前提	141
第三节	安定、统一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145
简短的结语		153
附录一	参考书目	155
附录二	大理总管段氏与蒙元政权关系大事记	165
后记		185

上 篇

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

杨慎《滇载记》云：“元既灭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蛮郡三十有七，设大理都元帅府，仍录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兴智封为摩诃罗嵯，管领八方。兴智死，元季乱，中原多故，段氏复据之，于是有十一总管出焉。”继乃列举十一总管之名，计为：一代总管信苴段实、二代总管信苴段忠、三代总管信苴段庆、四代总管信苴段正、五代总管信苴段隆、六代总管信苴段俊、七代总管信苴段义、八代总管信苴段光、九代总管信苴段功、十代总管信苴段宝、十一代总管信苴段明。”各本《南诏野史》所述均同，惟胡蔚本《增订南诏野史》于段明之后多段世一代，称“段氏袭总管十二世”云云。因此，又有十二总管之说。此十一或十二总管之名，见于《元史》者有信苴日即段实、阿庆即段庆。见于《明史》者则有段功（作段得功）、段明、段世。余不足征，而主要见于云南方志著录。可是各书所记段氏历代总管的世次、年历，歧出互异，颇有不同。所幸，近年来新发现的云南元碑，其中偶有一些有关史料可资取证。现据元碑及史乘中的记载稍事考察，作《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年历》，是为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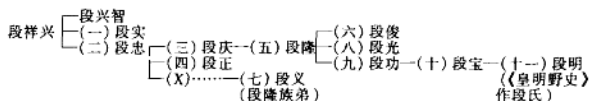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各书所载大理总管段氏的世次 年历

记载元朝大理段氏历任总管世次、年历较详，流传较广的当推《南诏野史》，但各本《南诏野史》所记不尽一致。兹据倪谔本《南诏野史》（据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淡生堂本，以下简称淡生堂本）、王崧校刊《南诏野史》（据《云南备征志》所收本，以下简称王本）、大理钞本《南诏野史》及胡蔚《增订南诏野史》（据坊刻本），分别表列所著大理段氏历任总管世次及年历如下。

第一节 淡生堂钞本《南诏野史》

一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世次



二 大理段氏十一总管在职年份

世次	总管名	任职年份	退职年份	在职年数	备考
一	段实	不明	有误	不明	
二	段忠	不明	大德三年己亥 (公元 1299 年)	不明	
三	段庆	大德三年己亥 (公元 1299 年)	大德四年庚子 (公元 1300 年)	一	
四	段正	大德四年庚子 (公元 1300 年)	不明	不明	
五	段隆	延祐四年 (公元 1317 年)	天历元年 (公元 1328 年)	十一	
六	段俊	天历元年 (公元 1328 年)	至顺三年 (公元 1332 年)	四	
七	段义	至顺二年 (公元 1331 年)	至顺三年 (公元 1332 年)	一	